

西安文物考古研究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安文物考古研究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ISBN 7 - 224 - 07041 - 6

. 西... . 西... . 文物 - 考古 - 西安市 - 文
集 .K872.41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2277 号

书 名: 西安文物考古研究
作 者: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蓝田立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6 开 28.5 印张 10 插页
字 数: 441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书 号: ISBN 7 - 224 - 07041 - 6/K·1171
定 价: 98.00 元

序

这本文集是为纪念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成立十周年而出版的。十年来,这个考古所不但对周丰镐、秦阿房宫、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部分的勘探、试掘工作,为制定四大遗址保护规划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而且配合国家的基本建设和群众的生产、生活,揭露新石器时代至秦、汉、唐时期的遗址 5000 多平方米;清理西周、战国、秦、汉、北朝、隋、唐、宋、金、元、明、清时代的墓葬 5000 多座,出土各类文物 3 万多件,为国家挽救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产,保存整理了丰富翔实并具有极高科学价值的田野考古发掘资料。在此基础上,该所科研人员秉烛笔耕,勤奋不辍,撰写了 300 多篇较有分量和影响的学术文章,发表在《考古》、《文物》、《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国家及《文物与考古》、《人文杂志》等省级刊物上,在周秦汉唐历史、考古的一些专题研究方面占有了一席之地,拥有了一定的发言权。他们还先后在文物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西安龙首原汉墓(甲编)》、《唐金乡县主墓》、《冠子研究》、《长安汉镜》等 25 部考古报告和专著画册,并受到了专家的好评。这一切,对于一个建所只有十个年头的考古所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其成绩也是必须肯定和值得表彰的。

西安市是周秦汉唐等中国历史上 12 个王朝的首都,历史积淀特别深厚,地下文物非常丰富,素有“华夏地下博物馆”的美称,因此也是文物考古工作的沃土。早在 1906~1910 年,日本人足立喜六就对西安的秦汉隋唐城址和皇帝陵墓进行过调查;1914 年,法国人色伽兰(V. Seglin)对西安等地的古建筑进行了调查;1923 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 G. Andersson)对西安地区的古遗址进行了调查;1924 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来西安讲学,计划“去陕西做点考古调查工作”,后因“河南和陕西遍地不靖”而未能成行。1930 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古物保护法》后,外国人在中国的文物考察活动受到遏制,中国学者的文物考古调查日渐活跃。1930~1933 年,徐炳昶、刘敦桢、常惠到西安从事周秦二族史迹的调查,他们将调查收获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科学》及《西京日报》披露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

关注。抗日战争结束后,何正璜、王哲之等学者又对西安的周秦汉唐遗址、遗迹进行了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安作为西北地区经济建设的重点,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如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央考古训练班等先后往西安派遣考古队站,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和实习。1953年西北考古工作队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隶属西安市人民政府文物事业管理委员会,西安市开始进行田野考古工作。

改革开放以后,西安的文物考古事业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配合基本建设的随工考古清理发掘工作陡然增多,这就迫切需要西安市有一个专门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机构,能够及时、高效、规范、有序地与建设单位紧密配合,确保“两利方针”顺利实施。为适应这种形势,1988年,西安市文物局正式成立了西安市考古工作队,1994年西安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了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其职责任务是:对西安地区的古代遗址、陵墓和古代建筑及历史文化名城的相关问题进行保护和研究;以配合国家经济建设为主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对西安地区的出土文物进行保护管理和考证研究;负责西安地区文物征集、文物资料、档案的收集整理和研究。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拥有一支年轻的朝气蓬勃的科研队伍。他们谦虚谨慎、求真务实、勇于创新。他们在大遗址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建设、西安地方历史研究、文物保护修复技术研究以及周秦汉唐历史研究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获得了一些颇有见地的科研成果。为保护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加强西安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弘扬人类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宣传西安,建设西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本文集共收入论文41篇,分7个栏目,即考古学探索、文物研究、古史探微、遗址调查报告、地方史研究、文物保护修复技术、文物管理工作。这个文集中的论文,除石兴邦、李学勤、刘庆柱、李毓芳4位学界大家的精辟论述外,其余39篇都是由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的科研人员撰写的。这39篇论文中也不乏站在国际国内学术研究前沿的精辟论述。在此我不一一细述,相信读者同仁从中都会有所体悟,并有所得,我在此不敢言序,仅作一向导,其中的得失取舍还请读者同仁评论。

西安市文物园林局局长 田党生

2004年9月8日

建所十年考古工作回顾

孙福喜 程林泉

西安市是周秦汉唐等中国历史上 12 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也是文物考古工作的沃土。早在 1906~1910 年,日本人足立喜六就对西安的秦汉隋唐城址和皇帝陵墓进行过调查;1914 年,法国人色伽兰(V. Seglirn)对西安等地的古建筑进行了调查;1923 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 G. Andersson)对西安地区的古遗址进行了调查;1924 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来西安讲学,计划“去陕西做点考古调查工作”,后因“河南和陕西遍地不靖”而未能成行。1930 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古物保护法》后,外国人在中国的文物考察活动受到遏制,中国学者的文物考古调查日渐活跃。1930~1933 年,徐炳昶、刘敦桢、常惠到西安从事周秦二族史迹的调查,他们将调查收获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科学》及《西京日报》披露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抗日战争结束后,何正璜、王哲之等学者又对西安的周秦汉唐遗址、遗迹进行了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安作为西北地区经济建设重点,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如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央考古训练班等先后往西安派遣考古队站,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和实习。1953 年西北考古工作队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隶属西安市人民政府文物事业管理委员会,西安市开始进行田野考古工作。

改革开放以后,西安的文物考古事业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配合基本建设的随工考古清理发掘工作陡然增多,这就迫切需要西安市有一个专门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机构,能够及时、高效、规范、有序地与建设单位紧密配合,确保“两利方针”顺利实施。为适应这种形势,1988 年,西安市文物局正式成立了西安市考古工作队,1994 年西安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了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其职责任务是:对西安地区的古代遗址、陵墓和古代建筑及历史文化名城的相关问题进行保护和研究;以配合国家经济建设为主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对西安地区的出土文物进行保护管理和考证研究;负责西

安地区文物征集、文物资料、档案的收集整理和研究。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拥有一支年轻的朝气蓬勃的科研队伍。他们谦虚谨慎、求真务实、勇于创新。他们在大遗址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建设、西安地方历史研究、文物保护修复技术研究以及周秦汉唐历史研究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获得了一些颇有见地的科研成果。为保护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加强西安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弘扬人类优秀传统文化,宣传西安,建设西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概 述

(一)概况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位于西安市友谊西路 68 号,为县处级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隶属于西安市文物园林管理局。全所人员编制 55 人。现在实有职工 59 人,其中 44 人为专业技术人员(高级职称 6 人,中级职称 20 人,初级职称 18 人)。绝大多数专业技术人员拥有本科以上学历(其中博士后 1 人、博士 1 人、硕士 4 人,本科生 22 人,大专生 12 人),所学专业基本上都是考古、历史、文物保护等,年龄构成基本上都是中青年。现全所已有 6 人获得考古领队资格。

自 1994 年正式成立以来,我所严格遵循新时期文物工作“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指导思想,抓改革促发展,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地向前迈进,在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与管理、文物修复及相关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为了进一步地提高田野发掘、文物保护与管理、文物修复及科学研究的水平,2002 年我所与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西安交通大学文物保护考古工程系磋商达成协议,联合共办教学科研基地。同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调查、勘探和发掘秦阿房宫遗址。这些合作为提高我所的科研水平和综合实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我所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活动,举办了西汉美酒研讨会、“粟特人在长安”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一系列学术会议,并邀请有关专家作了“中国古代都城的演变”、“丝绸之路与长安”等学术报告。此外,我所在日本、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单独举办外展多次,参加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外展 6 次、陕西省文物局组织的外展 20 多次,累计参展的文物达到 1850 件

次。迄今为止,库房文物已到过英国、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展出,为弘扬西安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经过不断努力,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现在已经具有了相当优越的科研条件和技术设控,科研实力相当雄厚。据初步统计,从1953年至今,我们已在文物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未来出版社、陕西美术出版社、西北大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出版考古报告、专著、著作、图册等20多部,在《考古》、《文物》、《文物天地》、《考古与文物》、《文博》、《华夏考古》、《中原文物》、《四川文物》、《东南文化》、《中国钱币》、《收藏》和《中国史研究》、《历史研究》、《秦汉史论丛》、《唐研究》、《周秦汉唐文明》等期刊杂志上发表论文、简报等专业文章300多篇。此外,历年来,我所有多人多次参加国际、国内的学术研讨会,并宣读研究论文,在国内外文博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业务部门简介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下设7个科室,其中有第一研究室、第二研究室、业务办公室、文物库房和技术资料室5个业务科室。

1.第一研究室

第一研究室以西安地区史前至秦汉时期遗址、墓葬等的调查、勘探和发掘等工作为主,并承担相应的研究工作和相关的科研任务。

目前,我所调查、勘探和发掘的史前至秦汉时期的重要遗址、墓葬有鱼化寨遗址、仙游寺遗址、周丰镐遗址、秦阿房宫遗址、汉长安城遗址、茅坡秦汉墓群、尤家庄战国秦汉墓葬群、龙首原汉墓群、乐游原汉墓群、凤栖原汉墓群、灞河汉代大型水上建筑遗址、响塘寨东汉墓群等。现已出版了《西安南郊秦墓》、《西安龙首原汉墓(甲编)》、《长安汉墓》等考古报告,并在《考古》、《文物》、《考古与文物》等专业杂志上发表了数十篇报告、简报和相关的研究论文。

2.第二研究室

第二研究室以西安地区魏晋南北朝、隋唐及其以后历史时期遗址、墓葬等的调查、勘探和发掘等工作为主,同时对现存的古建筑进行调查和保护,并承担相应的研究工作和相关的科研任务。

目前,我所调查、勘探和发掘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及其以后历史时期的遗

址、墓葬主要有隋唐长安城遗址、西安财政干部培训中心后赵墓、韦曲北塬北魏至北周墓、北周粟特贵族史君和康业墓、郭杜北周至隋韦氏家族墓、醴泉寺遗址、简家村隋唐墓群、唐金乡县主墓、西安东郊白鹿原唐墓群、西安东郊铜人原唐墓、西安地区唐三彩墓、高阳原隋唐墓、八云塔地宫、金代官印窖藏、元代壁画墓、明 阳王家族墓、明 开阳王家族墓等。现已出版《唐金乡县主墓》、《西安元代壁画墓》等考古报告,并在《考古》、《文物》、《考古与文物》等专业杂志上发表了数十篇简报和相关的研究论文。

3.业务办公室

为了配合西安地区基本建设工程的顺利进行,同时为了保护地下文物不致遭到建设工程破坏,我所成立了业务办公室。业务办公室主要负责西安地区建设工程考古勘探、发掘的对外谈判工作,签订考古勘探和发掘合同,同时协助分管所长将考古勘探任务分配给相关部门和人员,并对其考古勘探、发掘的过程进行质量监督,负责编写考古勘探报告书。

近年来,本着“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文物保护方针,业务办公室积极搜集西安地区基本建设工程的信息,及时与建设单位进行联系,以保证工程前考古勘探、发掘工作及时、有效的开展,防止文物流失、破坏现象的出现。目前,业务办公室在我市8区5县均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与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曲江管委会、长安科技产业园、泾河产业园区等大型建设园区签订了文物勘探和发掘协议,保障了建设工程中文物的安全。

4.文物库房

文物库房于1988年建成,总面积2600平方米。库房内现藏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市出土、征集、接受捐赠和其他单位移交来的文物总计12万余件,其中级别文物总计约1.5万件。文物种类有青铜器、金银器、玉器、瓷器、陶器、陶塑陶俑、钱币、铁器、石刻、字画、碑帖、印章及珍善本书等,其中不乏稀世珍品,如西周的永孟、战国的金虎符、秦代的高足玉杯、西汉的铜羽人、北周的石棺、隋代的董钦鎏金铜造像、唐代的都管七国银盒、“官”字款瓷器和三彩腾空马、元代盛懋的山水图卷等。

遵照国家文物局的有关要求,库房藏品全部按统一格式进行了登记造册,填写了藏品卡,建立了藏品档案。同时,级别库的文物已经实现了数字化管理。库房所有藏品的征集、调拨、出入库等都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库里的

工作人员除了具体负责文物的收藏、保护、管理、修复和内展、外展等工作外，还负责文物的鉴定与研究等工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库房文物先后参加国家文物局举办的外展6次，陕西省文物局举办的外展20多次，西安市文物局单独举办的外展多次，累计参展的文物达1850件次。迄今为止，库房文物已经到过英国、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韩国及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展出，受到了国内外专家和游客的高度赞誉。

5. 技术资料室

技术资料室下设文物保护技术室、图书资料室和科研档案室，1991~2000年还相继承担了《中国文物修复通讯》、《中国文物通讯》的编辑工作。

文物保护技术室设有专用的实验室和修复室，专门负责珍贵文物的保护和修复工作，并承担相应的研究课题。实验室配有常规的分析、检测仪器及药品，能独立完成初步的分析、观察和测定工作，为科学地保护文物提供依据；修复室配有相应的修复工具和设施，具备独立完成文物修复和保护的条件。目前，文物保护技术室在青铜器粉状锈的治理、陶器表面彩绘的保护、壁画的揭取和修复、漆器的提取、考古发掘中大型资料的提取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图书室资料室收藏历史、文物、考古方面的专业图书3万多册（其中8259册为线装书）、期刊杂志30多种。现正在进行图书目录的微机录入工作，以实现图书资料的数字化管理。

科研档案室负责全所科研档案的登记、保管等工作。为了加强田野考古资料的管理，我所制定了相关制度，要求各考古工地调查、勘探、发掘结束后，及时将文字、表格、照片、图纸等资料交给科研档案室分类保管。对于文物库房的藏品账目、照片、拓片、图片等资料，也要求复制一份，存放科研档案室统一保管。此外，收集全所每年出版的考古报告、专著、著作和发表的简报、论文等，进行归类存放，以备查用。

二、四大遗址的调查、发掘与保护研究工作

“秦中自古帝王州”。中国历史上，先后有周、秦、汉、唐等12个王朝建都西安，为这里留下了丰富灿烂、极其珍贵的文物古迹，周丰镐、秦阿房宫、汉长

安城、隋唐长安城四大都城遗址更是重中之重。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四大都城遗址,弘扬优秀的历史文化,我市历来重视对它们进行调查、考察、勘探和发掘等工作,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基础资料,这些资料是我市制定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基本依据。

20世纪70年代,在平整农村土地的热潮中,西安市的文物工作人员骑着自行车,对秦阿房宫、汉长安城、唐大明宫三大遗址进行调查摸底,保护了许多重要的夯土台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安市的文物工作者为四大遗址的保护、管理和利用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90年代以来,我所又为这四大遗址的更好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出谋划策,尽心尽力。

(一)周丰镐遗址

丰镐遗址位于西安城西南12公里处的沣河两岸。史载:文王作丰邑,在河西;武王都镐京,在河东。丰镐二京是西安地区首次出现的全国性都城,建都时间约为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是西周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丰镐遗址对于研究西周历史和都城的发展都具有珍贵的历史、科学价值,1956年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2~1975年,西安市文物事业管理委员会组成的考古小组参加了丰镐遗址的发掘清理工作。首先,在铜网厂南的宿舍楼与配件厂车间基建区清理西周墓葬80多座、车马坑3座。后来,在丰镐遗址的其他地区,如张家坡、新旺村、马王村、大原村一带陆续发现很多西周时期的墓葬。这些墓葬和车马坑中出土了铜鸾铃、铜锤、铜镮、铜当卢、铜凤鸟纹轴饰、各种铜泡等车马残件,还出土了饕餮纹的铜鼎、铜簋、铜鬲、铜卣、铜尊、铜觚、铜爵和窃曲纹鼎、凤鸟纹鼎、铜编钟、蚌鱼、蚌泡等遗物。

2001年7~8月,我所对丰镐遗址的保存现状进行调查,编制了《丰镐遗址重要遗存调查报告及保护措施》。其中总结了丰镐遗址历年考古工作的成果,并立足丰镐遗址的保护管理现状,提出了保护的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还制定了基本的保护措施和具体的保护意见。这些工作对加强该遗址的规划、保护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二)阿房宫遗址

史载:阿房宫始建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与秦咸阳宫隔渭河

相望,秦末项羽入关后焚毁。遗址在今西安市城西三桥镇以南,处于龙首原向南延伸的台地上,1956年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4年,根据西安市文物局的安排,我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勘探。这次的工作初步查明了遗址的大致范围为:北至三桥镇,南至和平村,东至古眺河,西至长安区纪阳寨一带。这次探明的重要遗迹有“前殿”、“上天台”、武警学院内的夯土基址(俗称“磁石门”)、纪阳寨的夯土建筑基址(俗称“烽火台”)等等。

2002年10月至今,我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阿房宫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全面的考古勘探和局部的试掘工作。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搞清了“前殿”夯土台基的准确范围(东西长1270米,南北宽426米),测量出夯土台基的最大高度为12米,证明了它是目前所知的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史上最宏大的夯土建筑。同时,基本摸清了“前殿”北部边缘呈台阶式的三层台面结构,初步判断出台面上应有廊庑一类的建筑,这与史书记载的阿房宫前殿“周驰为阁道”相符。此外,在“前殿”遗址南部边缘以南还发现一处较完整的铺瓦遗迹,是秦代考古和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个重要发现。

遗址内出土了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和铜镞等遗物,有的板瓦、筒瓦上带有“左司”、“左宫”、“北司”等戳印陶文。这些遗物的时代应为秦和西汉早期,说明遗址的始建年代为秦代,汉代作为上林苑的一部分继续使用。目前,该遗址的考古工作还在继续进行。

(三)汉长安城遗址

汉长安城是西汉时期的都城和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东汉作为陪都(称“西京”)继续使用,新莽、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王朝仍在此建都,延续使用了约800年。该遗址位于今未央区中部一带,1956年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所向来重视汉长安城遗址的调查和研究,及时将该遗址区域内发现的各种文物收回保护。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大白杨废品收购站征集到大量铜器,对研究汉长安城历史沿革、规划布局及汉代、魏晋、北朝的文化等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94年11月,在西安市文物局的领导下,我所派有关业务人员协助局里对汉长安城遗址的保护现状进行了一次详细的实地调查。经过调查与研究,找到了破坏遗址的主要因素(人口压力、产业结构不合理、乡镇企业对环境的污染、国家对遗址保护的投入较少等),并提出了保护遗址的具体措施,编写了调查报告。

2003年8月,为了促进汉长安城遗址的保护,我所有关业务人员协助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对该遗址的保护现状再次进行调查。这次调查使我们认识到:虽然汉长安城遗址没有安排大的项目建设,保存状况较好,但随着周围经济的快速发展,前景不容乐观,急需实施科学、有效的保护措施,以防止经济建设对它的蚕食。为此,我们正在拟订具体的、有可操作性的保护方案。

(四)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和唐大明宫遗址

隋大兴、唐长安城是隋唐时代的都城,规模宏大,布局整齐,是中国古代里坊制封闭式城市的典型。该遗址位于今西安市区。1996年国务院将其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根据陕西省文物局和西安市文物局的安排,我所组织专业人员于1997年5月对该遗址的保存现状进行了调查。经过调查得知:该遗址的绝大部分遗迹已被现代城市所叠压,破坏较为严重;至今保留在地面上的遗迹有安化门遗址、明德门遗址、芙蓉园围墙遗址、北墙遗址(两段)、西五台遗址、天坛遗址;另有一些重要遗迹如大明宫、青龙寺、兴庆宫、大兴善寺、大雁塔、小雁塔等已被保护、利用。在分析、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我所提出了保护该遗址的具体措施。如城墙可以通过绿化或立标志塔进行显示,城门和城墙四角可以砌砖保护或设立石碑等进行标示,街道可以通过巧妙的城市规划得以再现,里坊可以浓缩复原,东、西市和寺观等也可依照具体情况合理保护和展示。

唐大明宫是唐代的皇宫,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以后,一直是唐代政治中心的所在,晚唐毁于兵火。该遗址位于今西安城北龙首原上的坑底寨、孙家湾和含元殿村一带,1957年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二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明宫遗址的调查、保护、研究等工作,历来有所人员参加。

三、田野考古发掘工作

配合西安地区的基本建设进行田野考古发掘,是我所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从1988年考古队正式成立至今,我所已经独立承担了400多项配合基本建设项目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科学地揭示了新石器时代~明代的遗址十余处,清理出各个时代的墓葬近5000座,出土各类文物4万多件。

(一)新石器、商周考古

1. 鱼化寨遗址

2002年以来,我所在西安市西郊鱼化寨北外事学院新校区内,为配合操场建设,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钻探和部分试掘。遗址现存4万多平方米,是一处内涵丰富、保存完好的仰韶文化聚落遗址。

截至目前已发掘1750多平方米,分3个区域。 区、 区保存较差。 区保存较好,发掘出环壕2条、房址70座、灰坑(窖穴)170多个、墓葬58座,出土可复原的陶器100多件、各种生产工具和装饰品400余件,种类主要有钵、瓮、盆、罐、小口细颈壶、尖底瓶、碗、石斧、石铲、石镞、玉坠饰、玉笄、骨锥、骨笄、骨针、骨镞、圆陶片、陶刀、陶锉、陶环、陶笄、陶塑人头像、牙饰、蚌饰。

环壕2条。1号环壕位于内侧,保存较为完好,形状规整,呈圆环状,壕沟宽8.0~10.0米、深4.0~4.8米,西、东、东北方向各有一条通道。1号壕沟内堆积分两大层:上层含灰量大,层次分明;下层含灰量小,土质呈浅黄色,较硬。1号环壕内的聚落面积约为15万平方米。2号环壕位于1号环壕的外侧,两者相距约30米。2号环壕仅西部、南部和东南部保存较好,壕沟宽4.0~5.0米,深3.0~4.0米,西南侧、东南侧各有一条通道。

房址70座,有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两种。半地穴式房址一般为圆形,依壁为墙。地面建筑有圆形和方形两种,有的为烧土房,有的为木骨泥墙。

墓葬58座,其中瓮棺葬50座、灰坑葬2座、儿童墓6座。瓮棺葬以瓮、钵组合为主,以瓮、盆组合的仅有2座,瓮内随葬器物的有2座,钵底多凿一小孔,且部分以陶片覆盖。灰坑葬均为一次葬,系非正常死亡。儿童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仰身直肢葬,头向西北,墓内均有尖底瓶、钵、罐等随葬品。

根据目前的考古钻探、发掘及初步整理结果分析,该遗址以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即仰韶文化早期)为主,个别遗迹单位可晚至仰韶文化西王村类型,

对研究关中地区的史前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2. 仙游寺遗址

1997年11月~1998年10月,我所在周至县配合黑河引水和仙游寺法王塔搬迁工程中,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遗迹主要分布在仙游寺南面山坡的台地上和寺庙以东的区域,由龙山文化、先周、西周、战国延续至明清,打破关系十分丰富,对研究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

发掘出龙山、先周和西周时代的房址21座。其中8座为长方形半地穴式,白灰铺地,四角有圆形或椭圆形柱洞,室内中央设灶;12座为圆形半地穴式,直径1.6~3.4米,红色硬烧地面,周围有8~12个柱洞,门内侧设灶;1座为圆形地面建筑,室内中央有一个柱洞,地面有烧结块。

发掘龙山时代的窑址3处,一大两小,均为横穴式。大的直径3.2米,火膛边有一圆形半地穴式作坊,内有泥坯、陶模、石磨棒等物。另有唐代窑址1处、金代1处、元代3处、明代1处、清代1处,除一座龙窑外,均为馒头窑。龙窑在北方地区极为罕见,为研究北方地区窑室结构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珍贵资料。

发掘出13座战国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其中12座为仰身直肢,头向西;1座为屈肢葬,头向北。这13座墓均有生土二层台,台上头部有零散的兽骨。墓内共出土剑6把、戈1件、弩机4件、镞22件、锤1件,推测墓主应为将士,结合储粮窖藏的发现,推测战国时这里应为屯兵之地。此外,发掘出汉墓1座,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墓室四角垒有1.1米高的4个石礅,墓内出土“宜”字凤鸟纹镜一件。

遗址中共出土遗物160多件。除了上面提到的铜兵器、铜镜外,还有罐、盆、鬲、钵、釜、蒜头壶、茧形壶等陶器和石镞、带孔石斧、双孔石刀、石镞等磨制石器。

(二)东周、秦汉考古

1. 相家巷秦封泥遗址

1997年1~4月,我所在汉城遗址内的相家巷村南抢救性地发掘出土了3000余枚秦封泥及其他遗迹遗物。这些封泥中有反映秦中央政府职官的,也有反映地理及地方职官的,还有反映姓名的,它们对于研究秦汉封泥制度、秦汉官制及相关的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政府职官的封泥中,有反映皇帝的“皇帝信玺”,反映三公九卿的“丞相之印”、“左丞相印”、“右丞相印”、“御史之印”、“御府丞印”、“奉常丞印”、“公车司马丞”、“泰行”、“宗正”、“太仓”、“尚书”等,反映诸廐的“泰廐丞印”、“宫廐丞印”、“中廐”、“左廐”、“右廐”、“下廐”、“中廐马府”等,反映宫苑的“信宫车府”、“上寝”、“长信私丞”、“阳宫印”、“北宫”、“章台”、“安台丞印”、“阳陵禁丞”、“白水之苑”、“左云梦丞”等。

地理及地方职官的封泥中,有反映首都及故都“咸阳”、“咸阳丞印”、“西采金印”、“栎阳右宫室丞”等,反映郡及地区的“上郡侯丞”、“参川尉印”、“南郡司空”、“邯郸之丞”、“太原守印”、“四川太守”、“济北太守”、“琅邪司马”、“淮阳弩丞”等,反映县的“宁秦丞印”、“高陵丞印”、“下丞印”、“洛都丞印”、“兰陵丞印”、“乐成之印”等,反映乡的“都乡”、“中乡”、“左乡”、“右乡”、“北乡”、“广乡”、“西昌乡印”、“白水乡印”等,反映亭的“咸阳亭丞”、“邳亭”等。

反映姓名的封泥有“田固”、“牟胡”、“吕贺”、“谷志”、“高贺”、“卫多”、“苏段”、“上官卧”、“司马武”等。

2. 茅坡秦汉墓

1989~1990年,考古队在长安县郭杜镇茅坡村北西安光华胶鞋厂基建工地清理小型秦墓93座;2001年9月~2002年8月,我所在茅坡村南约50米处的西安邮电学院新校区基建工地清理小型秦墓162座、大型汉墓2座;2002年4~10月,我所在茅坡村西北政法学院南校区基建工地清理秦汉墓葬数十座。

茅坡秦墓基本为东西向。墓葬形制以长方形竖穴墓道土洞墓为主,也有少量竖穴土圜墓(多集中于光华胶鞋厂墓地)。土洞墓以直线式洞式墓为主,平形线式偏洞室墓较少。葬式以屈肢葬为主,也有少量直肢葬,头向多朝西。葬具为木棺,邮电学院墓地还有一座瓮棺葬。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有簋、盘、鬲、盂、鼎、盒、蒜头壶、釜、釜、盆、罐、瓮、钫、灶、钵、甑等,有的陶器上戳印“杜亭”、“杜市”等铭文,为确定茅坡一带就是秦代杜县所在地提供了依据;另外出土铜、错银带钩、玉带钩、铜镜、“半两”钱和铁器等随葬品。这批秦墓排列有序,时代从春秋早期延续到秦统一,时间跨度约300年,对研究西安地区秦墓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价值。尤其是光华胶鞋厂M75是目前西安地区发现的最早的秦墓,为研究秦国势力在西安地区的扩展提供了重要的考古依据。

邮电学院新校区的两座汉墓一南一北,均坐东向西,墓道为长斜坡,墓室为大开挖的竖穴式。葬具均为木筑棺槨,因朽蚀而仅存残迹。墓道内均有窑洞形龕室 5 个。这两座墓虽盗扰严重,墓室中仍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封泥、铜车马饰件、五铢钱、铜镞头、玉器等遗物,其中玉璧、玉、玉猪等玉器雕刻精美。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两墓墓道南侧原地表上均发现了建筑遗迹,其中墓室封土处残留的卵石铺设的散水及少量的回廊铺地砖、柱础石保存较好,全国少见,为研究汉代墓园建筑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政法学院南校区 M20 可推断为西汉御史大夫张汤的墓。它坐东朝西,由长斜坡墓道、甬道(带过洞)、墓室(土洞)组成。由于盗扰严重,墓内只出土了铜洗、星云纹铜镜、铜镞、铜铃、铜印、铜带钩、铜弩机、铜衔镡、铜当卢、赤仄五铢、铁剑、铁刀、铁削、铁铺首等遗物。铜印共两枚,为双面穿带印:一枚印文为“张汤、张君印信”,一枚为“张汤、臣汤”,应为墓主之印。

3. 尤家庄、潘家村、岗家寨战国秦汉墓群

1994 年至今,我所先后在西安北郊尤家庄、潘家村、岗家寨等地配合西北管道局、电信局第二长途通信大楼、陕西省交通学校、长安医院等建设单位发掘战国秦汉墓葬 1000 余座。这批墓数量庞大,分布较为集中,出土器物丰富,为西安地区战国秦汉墓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战国墓多为东西向,形制以长方形竖穴墓道直线式土洞墓为主,葬具为木棺,葬式有屈肢葬(蜷曲程度较轻)和直肢葬,随葬品以鼎、盒、蒜头壶、罐、釜、釜为主(也有少量陶鬲)。其中尤家庄 M20 为竖穴土圻木槨墓,有两个二层台,葬具为一棺一槨(带有一头箱),葬式为侧身屈肢葬。墓内随葬品丰富,主要置于头箱及墓室东北角的方坑内,有鼎(4 件,1 件为中原文化与楚文化交融的产物)、盆、灯、勺、镜、带钩、钮饰、铺首等铜器和银带钩、玉环、料珠、鼻塞、柱状器等,其中 2 件带钩均具有北方民族的风格。该墓时代为战国晚期(公元前 275~前 222 年),墓主可能是在秦为土的楚人。

汉墓多为东西向,形制有长方形竖穴土圻墓、竖穴墓道洞式墓、长斜坡墓道洞式墓,较晚出现了砖室墓,东汉出现了穹窿顶多室砖墓和带有假侧室的墓。葬具多为一棺,少数有槨。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多为单人葬,晚期出现了较多的双人葬,多室墓出现多人合葬。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种类繁多:早期以鼎、盒、钊、方形仓、灶、凹唇罐、小口绳纹罐为主,部分器物上有红彩几何形

图案;中期以后釉陶逐渐流行,出现了圆形仓、奩、成组小陶罐等,五铢钱常见,铁剑也较常见,随葬品的数量也有所增多;东汉时期随葬品数量非常大,常多至五六十件,主要有大罐、井、壶、案、勺、耳杯等陶器及猪、狗等陶俑。

4. 潘家庄战国秦汉墓群

2003年5月至今,我所在西安市南郊潘家庄村西、村南配合世家星城住宅小区的建设工程中,抢救性地清理出战国至宋元的墓葬280余座,其中战国秦汉墓约200余座。

秦墓约100余座,多为平行线式竖穴墓道土洞墓。墓道大多宽于墓室,口大底小,部分墓道长壁一侧有小龕。墓室口两壁及底部有封门槽,推测原有木板封门。墓室为长方形土洞,两壁近封门处多有1到2个小龕。葬具除一座墓为一棺一槨外,其余均为木棺,棺下铺有草木灰,人骨大多已朽。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葬,少数为屈肢葬,头位于墓室口一端。随葬品非常丰富,有鼎、盒、蒜头壶、釜、釜、灶、盆、甑、罐、缶、孟等陶器27种547件,鼎、壶、釜、勺、剑、镜、带钩、印、铜钱(半两)、铃等铜制品93件,灯、锤、斧、锄、环等铁器30件,环、饼、剑首、剑格、剑、凿等玉石器29件,另外出土楚国金版“郢冉”一枚。有的陶器上戳印“杜亭”、“杜市”等陶文,对确定秦国杜县的范围及探讨秦国、秦代手工业的发展情况有一定价值。这批秦墓上起战国晚期,下至西汉初期(不晚于武帝时期),保存较为完整,随葬品丰富多样,器物组合较为特殊,是研究关中地区秦墓发展、演变的珍贵资料。

汉墓既有东西向,也有南北向。墓葬形制以竖穴洞室墓和斜坡洞室墓为主,也有少量砖室墓。葬具为木棺,葬式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较为丰富,主要是鼎、盒、钫、仓、罐等陶器。此外,西汉早期墓M209出土陶俑10件,东汉墓M169出土一件多枝灯和一件组装马桶等,另有一座墓中出土跽座俑7件(其中2件为胡俑)。这些陶俑制作工艺精美,造型生动,尤其是胡俑的出土对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5. 龙首原汉墓群

改革开放以来,我所在西安市北郊龙首原上的范南村、枣园村、方新村、龙首村、二府庄、青门村、马乎沱等地(汉长安城遗址的东南郊)配合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古墓葬近500座。这些墓葬除个别为北朝、宋、金时期的墓葬外,其余都是汉代墓葬。这批汉墓可分为西汉早期、西汉中晚期、新莽和东汉